

专题

← (上接5版)

胡适特来单独拜访。张元济日记记:

胡适之来谈,闻筱庄言拟在京有所组织。余答以前闻大学风潮,颇有借重之意。胡又问,此系前说,后筱庄又托人往谈,似系托搜罗人材。余言亦有此意,京师为人材渊藪,如有学识优美之士,有余闲从事撰述者,甚望其能投稿或编译。

然而胡适既不清楚张元济或商务能在怎样的程度上“借重风潮”,而且他还想要继续开拓自己的学术生涯,所以两人谈得也很委婉。

三年前,黄炎培曾向张元济推荐蒋梦麟,但蒋当时还未正式毕业回国,而张元济更想联络的人物是“极活动于社会上,甚有势力”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总干事余日章。张听说余在青年会的月薪是250元,便立刻表示愿意加价100元,虽然最后也未能成功。蒋梦麟则在回国后到商务工作了将近两年,由于主编《新教育》月刊,与北京大学师生产生了“知识上的密切关系”,进而使他“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”。

当时,张元济对商务用人过于保守、裙带关系泛滥深感不满,但领导层中很多人并无危机意识。由于这样的观念分歧,去年张元济曾请求辞去经理职务,并给另一位商务元老高凤池写信提出六条意见,前三条便是“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,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,勿以为人材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”。从清末翰林、维新士人一路走来,张元济很清楚社会日新月异,不进则退。

张元济与高凤池在商务用人之事上意见凿枘,当年10月8日,张元济致高长信:

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,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;公司专为老无能之人保其地位,而新进之辈必将灰心;无知监督之人皆尸位素餐、知识不逮之辈,新进之人何以心服。

弟生平宗旨,以喜新厌旧为事,故不欲侧身于政界。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此成绩者,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。

张元济还曾推荐过丁文江、徐新六等人入馆,高均以“素不相识”为由拒绝。张树年记父亲暮年曾回忆与高公共事的苦衷,高凤池私心颇重,两人在人事上最见分歧,尽管如此,私交仍保持友好。

采稿方向“实太偏于旧”

10月间,“上下古今”但销

量不佳的《东方杂志》终于改换主编。当初《东方杂志》由编译所理化部负责,部长杜亚泉同时担任杂志主编。这一年来他在《东方杂志》上连续撰文申述自己对新与旧的看法,反对完全抛弃传统的思想文化。这种立场和越来越激昂热烈的舆论难以相容,同仁陶葆霖也评价他的采稿方向“实太偏于旧”。张元济曾起意拓展稿源,由陶接管《东方杂志》,此事到10月28日,由张元济正式向杜亚泉说明。

除了《东方杂志》,张元济也向《小说月报》和《妇女杂志》的主编王蕴农施加了压力。王不得不对《小说月报》做些改变,准备从明年的第一期开始,用杂志三分之一篇幅设立一个“小说新潮”栏目,专登西方小说或剧本的译作,并让茅盾放下手头的《四部丛刊》修版覆校和《学生杂志》若干事务,来负责这个栏目。这个栏目与中文创作的小说完全无关,因此茅盾把它叫做《小说月报》的“半革新”,但这毕竟使“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”,因为再过一年(1921年),茅盾就成为这份杂志的正式主编,新的《小说月报》与文学研究会一同诞生了。

周予同回忆五四以后编译所的气氛:“商务印书馆受了这文化运动的刺激,对于所出版的杂志,不能不有一种革新的计划。那时,我们都还年轻,办公的地点在一起,那种放言高论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越情形,到现在回忆起来,还历历如在眼前。”

五四前后

五四当天,张元济正约胡适、蒋梦麟在兴华川午餐。他们还不知道,就在同一时间,北京的大学生们正为“外争主权,内除国贼”云集涌动。这股力量最终将卷起蒋梦麟眼中的“大漩涡”,茅盾眼中的“洪流”。

茅盾回忆,千里之外的风

波起初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事件,对大人们工作生活的日常没有什么影响。然而很快,7日,发行《新青年》的上海群益书局带头登报宣布后日停业,书业商会很快跟进,通告各企业同日停业,以表“抵抗日本及对于北京学生敬爱之意”。商务印书馆当然亦在其列。

不可开交的同业竞争

至6月,学生们走访商店请求罢市。5日,“发行所午前十一时闭门。先留一小门,午后约三四钟全闭”。商务在闸北的印刷厂也“因工人不守只得停工,商议不如自停,遂出通告,午后停工”。

罢工第一天,同一条街上的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来访,希望在应对罢市上与商务统一阵线。根据张元济在日记里的记录,陆费逵的态度是“拟竭力维持,万一不能,决不给薪”。商务内部会商,高凤谦打算“一律给半”,鲍咸昌认为“与寻常加工资不同,亦宜酌给”,张元济本来打算只发本日和明日的薪水,后来改主张无论罢工几日,发三分之一薪水。王显华后来也同意张元济的办法。从6月6日到11日,日记每天天头都在重复“本日仍未开市”或“本日仍罢市”,10日写“昨日商会发传单请本日开市,仍无效”。张元济要求各处同人在上班时照常到馆,“整理内事,事毕亦宜早归寓,免遭意外”,但员工们对此态度勉强。商务领导层也有人提出“不如对于小薪水之人略予津贴,令其散去”,张元济担心“一经散去,将来开市无法通告”,没有同意。到6月12日,印刷厂正常按时开工,发行所则盯着相邻的店铺,“中英药房先开,本馆继之,中华亦即踵行”。

罢工的担忧刚刚解除,另一件危机接踵而来:一份日本杂志刊登一篇题为《实业之日本》的文章,把商务印书馆也归入中日合办企业之列。商务1903年起步阶段曾有日资,到1914年将这部分股份全部回

购。那次回购的契机之一,就是中华书局在与商务的教科书战争中抓住商务的日资软肋,宣扬商务一面出版“共和国教科书”,一面却是半个日本企业。在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抵制日货风潮之下,《实业之日本》这篇文章可能成为仍使用日本印制工艺、日本原料,聘请日本技师的商务印书馆的定时炸弹,商务高层对此极为重视。

6月29日是周日,张元济约商务高层鲍咸昌、王显华、高梦旦、李拔可、陈叔通、夏剑丞在寓所晚饭,席间大家讨论决定,立刻联系这个日本杂志社,提供回购股份的合同照片证明商务印书馆如今已非中日合办,请他们更正信息;同时直接写好更正告白的底稿,并把那份合同制成铜版,请该社一并刊登。另外,向农商部报告此事。

此前商务解聘了半数日本技师,席间王显华又提议“代雇德人数名,来任印刷或制造之事”。商务一向紧跟外国技术,保持在国内的技术领先,保证高质量的产品。张元济曾经对一位中国造纸商表示:“必须足与外人竞争,若专以国货提倡,恐难持久。”

但商战还是如期而来。7月17日,商务印书馆接到一封匿名信,说那篇《实业之日本》有关商务为中日合办企业的报道,“某局已译成华文,每册售3角,并另印传单,分寄各省学校。”商务立刻写了一份广告,以1000元赏金征集关于制造、散布该文中译本的信息和证据,18、19两日连续登在《申报》头版。张元济这两天的日记也都在“同业”一栏写下“发《赏格一千元》广告”。到第三天,中华书局也在《申报》上应战,登了《答商务印书馆赏格一千元》广告,一一回答商务赏格中的问题,编译印行那篇文章的就是中华书局,所有证据“存中华书局总厂”,最后还揶揄道:“至该馆赏格酬洋一千元,当捐入学生联合会,望该馆送交该会为幸。”

两家出版社闹得不可开



张元济日记(1916年7月27日,星期四) 上海图书馆藏

交,来回对登告白、启事。最后闹上法庭,判决结果商务胜诉,中华赔偿损失10000元。商务把这笔钱捐给了本馆开办的尚公小学。

两位辞职南下的老友

五四一事,北洋政府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教育部与教师,据说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到暗杀的威胁,还有人暗示他如不辞职,将使学生遭到报复。于是在学生保释的第二天即5月8日晚间,蔡递交辞呈,次日清晨五点启程前往天津,并在《益世报》上留下一条扑朔迷离的启事:“我倦矣,‘杀君马者道旁儿’,‘民亦劳止,迄可小休’,我欲少休矣。”身为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反对解散北大或罢免蔡元培,11日也被迫辞职,避居北京西山。而政府中传来消息,将由两位安福系人物接替蔡、傅的职位。

张元济与蔡元培同乡同岁(以阴历计),同榜中举,又同榜登科。他们都对西方文化和变革抱有热忱,自进入翰林院以来就过从甚密。戊戌之后,两人各自经历一段曲折的岁月。张先到南洋公学,后入商务印书馆;蔡元培则选择在年届四十时赴欧深造。而蔡旅欧期间为商务印书馆编书糊口,就是张促成的。

蔡元培递上辞呈后不久来到上海,在法租界的密采里饭店住了几天(这里的法餐堪称上海当时最高级的西餐)。张元济在5月18日给傅增湘发信慰问,第二天在密采里见到了蔡元培。几天后蔡元培隐居到西湖畔的一处友人住所,着手整理一位晚清学者的日记。这部日记也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他的弟弟蔡元康代表他与外界联络。

7月3日,张元济写给蔡元康一封信,劝告蔡元培“不可轻于再出”。理由一是五四引发的一系列变动(包括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钱能训相继请辞等)的

(下转7版) ➔